

新质生产力何以提升企业组织韧性?

余东华 苏琦

摘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宏观背景下,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企业提升组织韧性和构筑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路径,也是企业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和外部冲击的战略举措。本文在解析企业组织韧性及其动态能力的基础上,研究新质生产力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制,并基于2011—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提升企业组织韧性,该促进作用通过缓解供需偏离度、提高内部控制水平和助力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等机制实现;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组织韧性的提升效应在高市场势力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内企业更加明显。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企业核心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能够为提升企业组织韧性创造内在驱动力,从而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企业组织韧性 动态能力 市场竞争优势 供需偏离度 全球创新网络

中图分类号:F014.1;F27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6)07-0016-16

一、问题提出

当前,中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地缘冲突频发,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在这一大背景下,企业可能面临着供应链中断、颠覆性技术冲击、现金流断裂和市场信心崩溃等造成的生存危机与发展挑战。组织韧性作为企业维持稳定与发展的一种特殊能力,能够有效应对不确定性环境带来的外部冲击,提升组织韧性是企业多重挑战中确保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1]。新质生产力是一种以关键性、颠覆性、前沿性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新型生产力质态,是企业打造稳健生产经营体系以应对危机的新型动态能力,也是企业通过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构筑长期韧性优势的新型驱动力。因此,探究新质生产力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其组织韧性是支撑中国宏观经济韧性的关键所在^[2]。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的运营环境愈发错综复杂,以追求效率与规模为主的传统生存逻辑开始显示出局限性,韧性优先的发展战略作为关乎企业存续的根本性保障,已经成为企业实现永续发展的新趋势。当前,企业在提升组

收稿日期:2025-11-15;修回日期:2026-06-22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研究”(24ZDA02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评估指标、发展规律与路径选择研究”(23AZD027)

作者简介:余东华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黄河国家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250100;

苏琦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者感谢审稿快线专家的评审意见。

组织韧性时还面临一些制约因素,主要包括预见性不足与资源困境,传统的风险管理模式存在滞后性,冗余资源储备面临成本与效率的两难境地;决策迟滞与组织僵化,企业的决策机制与组织结构无法适应危机时信息传递的快节奏要求;路径依赖与创新缓慢,企业发展高度依赖要素投入,转型升级的战略眼光与能力不足等。这一系列问题使企业亟待引入一种全新的生产力范式,以赋能其跨越现有的韧性培育瓶颈。新质生产力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所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关键在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3]。培育和发展生产力,不仅能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更是应对全球格局深刻调整、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支点。系统探讨如何通过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企业组织韧性,能够为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中构筑可持续竞争优势提供理论指引。尤其是,聚焦于微观企业层面,探讨新质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新型生产要素应用与配置、数字化发展方式的全方位渗透以及新兴发展模式,能够为应对当前企业组织韧性培育中面临的诸多挑战提供重要契机。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将适应性循环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以及动态能力理论相结合,解析企业组织韧性表现出的动态能力,研究新质生产力如何通过赋能企业抵御风险能力、反应与调整能力、恢复与发展能力等动态能力,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理,为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价值与组织韧性生成的微观基础提供新视角。第二,综合企业内部运营与外部环境两方面的因素,多维度阐释新质生产力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的作用机制。通过分析供需协调与控制治理的内部优化与全球创新网络融入的外部链接这一内外联动的机制,为理解提升企业组织韧性提供更为全面的解释。第三,跳出特定的、短期的危机应对情境,在长期连续性时间中考察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基础性、演进性的赋能力量,对企业组织韧性的提升作用,从而验证新质生产力赋能组织韧性的主要方式是对企业内部核心能力的塑造,为企业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冲击提供新思路。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研究紧密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学术界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研究主要聚焦于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首先,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加快新型工业化的必由之路^[4]。新质生产力通过融合新技术、新产业与新要素,为新型工业化注入核心驱动力,推动其向高端化、智能化与绿色化演进^[5]。其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选择。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的产业载体,新质生产力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最具活力的革命性力量,其形成过程就是对产业体系进行系统性重塑的过程^[6]。最后,新质生产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实现发展动力的根本性变革,在创造更丰富物质财富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7]。总体来看,有关新质生产力影响效果的研究中,以宏观层面的理论研究为主,微观层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第二,组织韧性的理论内涵与影响因素。已有研究将组织韧性的内涵分为两种:一种是从“生存”理念出发,认为组织韧性是在系统遭受冲击后承受并恢复至原有状态、维持其基本结构稳定的能力;另一种从“发展”理念出发,认为组织韧性不仅限于生存,还应具有在不利环境中主动寻找机遇实现发展与繁荣的能力^[8]。当前企业的战略目标已超越单纯的生存而转向追求可持续增长与竞争优势,后者的定义更契合现实需求与实践指导价值。围绕组织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组织内部来看,组织韧性可能受到个体、团队、组织三个层级的影响^[9]。在个体层面,坚韧型的领导有助于企业从危机中恢复反

弹^[10];员工个人具有更好的认知、行为与关系能力时,也可以更好地预测和应对危机事件^[11];在团队层面,良好的内外部关系网络可以帮助企业充分调动和利用内外部资源,从而更好地在危机环境中适应并生存^[12];在组织层面,一方面,企业所持有现金资源与耐心资本有助于增强组织韧性^[13],另一方面,支持创新与开放的企业文化能够增强企业组织韧性^[14]。从组织外部来看,外部资源与技术环境也是组织韧性发展所依赖的关键因素^[15],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行为会对组织韧性产生影响^[16]。

第三,新质生产力与企业组织韧性的关系。目前,鲜有文献直接将新质生产力与企业组织韧性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但已有部分文献就企业的数字化与创新行为对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展开讨论。王鹏和陈蝶欣从能力视角定义企业组织韧性,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的抵御、恢复与革新能力^[17]。单宇等认为,危机情境下企业组织韧性的形成涉及激活、适应性重构与转化三个关键要素,并通过案例分析发现,数字化通过数智赋能在危机各个阶段影响企业组织韧性,危机情境的外部压力使得数字化呈现出跃升特征,使得组织韧性的升级呈现激进性特征^[1]。杨伟和汪文杰则从长期主义视角出发,将组织韧性划分为稳定性与应变性,以此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组织韧性的提升作用^[18]。贾勇等认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行为能够使企业在遭受冲击后快速恢复,并且当企业采取双元创新模式时企业组织韧性能够得到显著提升^[19]。

尽管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等单一要素对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为理解新质生产力与企业组织韧性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有益启示,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并非由单一技术或要素构成,而是由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及三者的高效协同构成的有机整体,目前有待基于这一完整框架,深入探究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复合系统对企业组织韧性的驱动效应。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偏重将组织韧性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进行探讨,较少从内在动态能力的多重维度对其进行系统性解构,并考察新质生产力各要素如何针对性地作用于这些组织韧性的动态能力,且新质生产力对企业能力体系的重塑与构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对组织韧性的提升作用可能在长期连续时间中更为显著和稳定,而当前研究较多集中于在特殊的危机情境下考察组织韧性。鉴于此,本文在新质生产力的完整内涵框架下,探究其对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逻辑与作用机制,将企业组织韧性中包含的动态能力在理论层面作进一步解构,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分析新质生产力如何为企业注入持久的韧性潜力。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整合现有研究^[17,20],本文将企业组织韧性定义为企业所拥有的应对外部冲击、维持稳定经营并实现持续自我发展的一种动态能力,这一能力是企业应对不确定性风险、构筑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无形战略资源。首先,依据适应性循环理论,企业所积累的抵御潜在危机的综合能力,不仅直接决定了其吸收初始冲击的阈值,更构成了其在危机中调整与复苏的弹性基础。其次,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揭示,在危机应对过程中,企业通过分布式感知、学习与自组织所展现的反应与调整能力,是企业适应危机引发的变化、维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机制。最后,动态能力理论指出,为真正超越危机,企业需要对战略、资源与惯例进行根本性整合与重构,以此催生出的面向未来的恢复与发展能力,是企业实现组织能力跃迁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进一步地,恢复与发展能力的形成,会反哺并强化企业在资源、知识、结构等方面的新一轮储备,从而提升其对未来潜在风险的抵御能力,由此推动组织韧性实现螺旋式上升的动态演进。综上,本文将企业组织韧性所展现的动态能力解构为抵御风险能力、反应与调整能力、恢复与发展能力。

(一) 新质生产力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的内在逻辑

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

战略任务之一。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创新驱动的本质特征与企业组织韧性的动态能力之间高度契合。新质生产力由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构成。其中,新质劳动者所具备的持续创造性与高效适应性为组织韧性动态能力形成提供优质人力资本,新质劳动资料是组织韧性动态能力构建的核心技术底座,以数据为代表的新质劳动对象是组织韧性动态能力提升的关键驱动要素,三者相互结合能够为企业组织韧性的系统性跃升提供动力来源。

首先,新质生产力通过强化资源储备水平与风险预警效能,为企业构筑抵御系统性风险能力提供关键支撑。在资源储备方面,企业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储备足够的人才、数据、资金等资源,可以在危机发生时保障核心能力延续、支撑精准决策与维持连续运营,增强企业的“抗逆力”。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导向有利于吸引创新型人才,从而实现高素质人力资源的集聚,为应对外部冲击储备高质量人力资源。数据要素是当代经济活动中的关键生产要素,新质生产力发展使企业拥有兼具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数据储备体系,推动数据资源呈现出规模扩张与结构优化的双重特征^[21]。在资金储备方面,随着新质劳动力、新质生产资料与新质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发展动能不断释放,将持续提升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效率,从而带来高水平的企业绩效,直接增加企业现金流。同时,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绿色生产力,是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其发展过程中企业必然会履行“降碳、减排、增效”等社会责任,这有助于企业获得政策资金支持。以技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新质生产力能够实现产品与服务的快速迭代升级,帮助企业有效应对市场变化,保持竞争优势,向市场传递出积极信号,提升投资者预期与信心,从而获得投资者的融资支持。在风险预警方面,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提升企业信息来源的多元性与信息挖掘的深度,避免由于信息缺失与因果模糊而造成反应滞后,帮助企业在危机发生前将“被动响应”转变为“主动预警”。一方面,得益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更高效、更智能的劳动资料与更大范围的劳动对象,企业能够满足的市场需求更多样,客户与供应商群体的规模得到扩展,从而可以收集到涉及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的信息,通过整合上下游信息资源,形成广覆盖的外部风险感知网络。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发展依托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信息技术能够提升企业的数据处理能力与数据深度开发能力,通过对多元数据信息的深入挖掘,识别潜在危机事件的演化路径,为企业有效制定前瞻性预案提供依据。

其次,企业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企业进行及时的内部反应、灵活的战略调整与多元的供应链配置,从而使其在危机中进行有效反应与调整。第一,新质生产力中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要素深度融入企业运营之中,能够提升企业管理效率,助力企业构建起统一的信息共享中心,推动组织结构向纵向扁平化与横向网络化演进,使得信息得以高速、无损流动,提升企业面对危机的内部反应速度。第二,新质劳动者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构成要素,拥有高度创新性的思维模式,尤其是高管群体能够凭借数据驱动下的前瞻判断能力与全局战略视野,为企业构建系统性的市场策略和发展战略储备,以在面临危机时灵活调整战略决策。第三,新质生产力可以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与产品竞争力,从而促进多元化供应链配置。一方面,盈利能力的提升直接增强了企业在上游供应链的议价能力,这种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对供应商选择权的强化,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从而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配置。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对市场需求的深度洞察与高效响应,使得企业产品与服务能够精准匹配客户多元化需求,由此形成的产品竞争优势帮助企业打破原有相对单一的目标客户结构,拓宽了市场覆盖范围,实现客户的多元化配置。基于上述维度构建的多元化供应链配置,使企业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能够凭借多元化的替代路径对内部生产与运营活动进行快速重构与调度。

最后,新质生产力能够提升企业的恢复与发展能力。一方面,数据、算力与算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能够共同推动企业在危机后的快速恢复与组织重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使数据的捕捉能力突破传

统边界,形成覆盖宏观环境、中观产业和微观运营的全方位数据库,使企业在危机中的脆弱性特征能够具象化呈现,为企业在恢复期识别自身发展漏洞提供基础素材。强大的算力能够对多维数据进行高效处理和深度解析,快速且完整地呈现出危机的传导路径并生成多场景的恢复方案,帮助企业实现在危机后的漏洞识别和系统恢复。在此基础上,企业凭借前沿算法完成关联规则挖掘与跨界知识交互,预测新的价值增值点,进一步发现并捕捉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拥有新质生产力的企业凭借其深层根植的创新意识和坚实的创新基础,通过认知层面的主动突破和物质层面的技术支撑,使企业拥有危机后恢复与发展的独特优势。拥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对变革的抵抗力更小,态度更开放,能够成功地接受、调整、执行、利用新想法,使得企业突破“损失厌恶”的决策惯性,将危机转化为创新的触发点,实现对危机发生前发展状态的反弹与反超。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是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过程,由此产生的创新基础通过知识复用降低转型成本,并依托研发惯性加速技术突破,为核心业务恢复提供支撑的同时,推动企业摆脱路径依赖,催生新产业与新业态,从被动修复转向主动升级,从应对危机生存转向利用危机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1: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提升企业组织韧性。

(二) 新质生产力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的主要机制

1. 缓解供需偏离度

新质生产力能够赋能企业柔性生产并提升需求研判能力,缓解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供需偏离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技术渗透与人力资本升级赋能企业开展柔性生产。具有新质生产力特征的数字技术渗透在企业生产与管理的各个环节,将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应用到生产流程之中,助力企业高效地对生产流程进行智能化管理与优化,从而能够以较低的转换成本满足差异化市场需求,在生产环节兼顾产品柔性^[22]与产量柔性^[22]。新质劳动力是柔性生产体系运行的关键执行者,智能化生产设备的复杂系统需要高技能劳动力的操作与维护,并且柔性生产技术本身是在不断演进与发展的,高素质劳动力所拥有的自主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是企业开发新产品、应用新工艺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发展会降低企业对于外部信息的搜寻成本与验证成本,提升企业的市场需求研判能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支持智能化信息共享平台的构建,例如供应链协作平台的上线,通过企业间点对点共享或信息集中管理等模式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企业将原本无法观测的私人信息变为共有信息,得以实现对价格、需求水平等多维数据的实时归集,减少信息搜寻的盲目性与冗余性,同时强化了信息的真实性,从而提升对产品需求把握的精准度,提高企业根据需求数据对生产行为进行改善的信度与效度。

供需偏离度的缓解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快速的生产调整与机会捕捉,从而提升企业的反应与调整能力以及恢复与发展能力,推动组织韧性的持续强化。在反应与调整能力维度,供需偏离度较低的企业柔性生产系统本身并非处于僵化状态,从而通常能够摆脱生产的惯性束缚,快速调整资源配置切换生产任务,使企业在不确定冲击下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流程,维持基本运营的连续性,为危机化解争取战略缓冲期。在恢复与发展能力维度,供需偏离度较低意味着企业从需求识别到生产落地的响应周期较短,企业能够利用快速捕捉到的市场需求,在市场窗口期内快速生产出与需求适配的新产品,帮助企业在市场恢复期打破路径依赖,培育发展新动能。双重路径合力推动企业形成从风险应对到价值创造的系统性韧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2: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缓解企业供需偏离度,从而提升企业组织韧性。

2. 强化企业内部控制

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促进信息沟通、风险评估与内部监督强化企业内部控制。科技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在这一环节中发挥关键作用。首先,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企业内部信息沟通提供技术支撑。通过内部一体化信息共享平台的搭建,企业可实现跨部门、跨层级的信息共享,降低信息滞后与失真导致的

风险,从而构建起敏捷高效的企业内部信息生态。其次,新质生产力能够依托强大算力提升企业风险评估水平。基于海量内外部数据的深度整合,经由先进算法模型进行动态挖掘与智能分析,在算力的支撑下实现对内部运营与外部环境潜在风险的精准捕捉。最后,新质生产力显著提升企业内部监督水平。依托区块链等技术,企业能够实现业务流程数据的自动留痕,并且从技术层面阻断数据篡改,避免由于证据缺失与数据失真造成的监督失效问题,同时数据透明化有效缓解委托代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效抑制代理人的道德风险,保障企业治理的合规性与运营的规范性。

内部控制作为企业重要的治理机制之一,能够提升企业的抵御风险能力、反应与调整能力、恢复与发展能力,从而对企业组织韧性具有显著的增强作用。首先,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通过确保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活动的合规性与资产的安全性,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从而向市场传递出公司治理完善、运营稳健有序的积极信号,能够显著增强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信心,这将直接转化为企业的融资优势,强化企业抵御风险能力的财务基础^[23]。其次,内部控制基本要素中的信息与沟通,能够有效破除企业面临的“信息孤岛”问题,为企业构建起一个覆盖企业内外部信息收集、处理与反馈的网络,从而能够在危机前及时感知风险、精准进行决策调整并快速采取统一行动。最后,内部控制中的风险评估作为一个动态迭代的管理过程,会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及战略目标的变化,识别出新的威胁与机遇,一方面能够帮助企业感知内外部潜在风险,有效强化风险预警,以支撑企业整体抵御风险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在出现外部冲击后,企业通过风险评估能够识别出内部风险暴露的薄弱环节与可利用的优势资源,筛选出兼顾安全性与发展性的战略选项,为企业寻找出可靠的恢复与发展路径,实现组织韧性的实质性增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强化企业内部控制,从而提升企业组织韧性。

3. 助力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降低成本和破除壁垒赋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依托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的成本。拥有数字化能力与跨文化素养的新质劳动者,能够精准理解全球创新网络中不同节点的技术语境与文化偏好,降低在融入过程中因认知差异和沟通障碍造成的摩擦成本。人工智能、新型技术等新质劳动资料的应用,能够提升对国际化经验学习的效率,加速自我更新与迭代,弥补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发展差异,降低由于“外来者劣势”产生的融入成本^[24]。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企业突破进入壁垒,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当前跨国投资面临众多绿色贸易壁垒、蓝色贸易壁垒,进入全球创新网络需要符合东道国政府监管要求,而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能够使企业实现生产过程清洁化、资源利用循环化、能源消费低碳化,从而满足进入东道国的合法性要求。

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通过构建跨越地理边界的资源流动系统,为企业全方位提升组织韧性的动态能力提供动力来源。首先,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使企业接触到东道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异质性资源,包括知识、人才、技术以及互补性研发基础设施,提升了资源的多样性与富裕度,这种分散化、多元化的资源布局显著优化了企业抵御风险能力所需的资源根基。其次,通过分布于全球不同创新生态中的节点,企业能够实时捕捉前沿技术动向、市场异动信号、潜在政策变动等,通过整合与分析,能够比单一国内视角更早、更准确地识别出潜在威胁,从而完善了企业抵御风险能力所需的风险预警机制。再次,全球创新网络为企业建立较多的外部联系,从而能够获得不同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形成的差异化知识,包括解决问题逻辑与应变惯例,这种认知多样性可以为企业应对危机提供非常规的解决方案,促使企业在危机发生时实现快速的反应与调整。最后,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能够帮助企业更广泛地掌握多元化的市场信息和先进技术的发展动态,从而能够快速扫描并整合全球范围内的新兴市场需求与技术创新机遇,增加企业从危机中恢复至原有水平并进一步

实现超越性发展的可能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4: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从而提升企业组织韧性。

四、实证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2011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创新驱动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的核心位置,并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就在战略层面、政策层面和产业布局上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按下了“快进键”,也触及了新质生产力中“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新兴产业为载体”的基本内核。基于此,本文在实证分析中选取2011—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CSMAR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万得(Wind)数据库和上海经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按照如下步骤对样本数据进行筛选:为排除财务异常和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企业的干扰,确保结论反映正常市场环境下企业的普遍规律,剔除ST、*ST类上市企业;金融业与非金融业由于商业模式、财务报表与监管环境等存在根本性差异而缺乏可比性,为避免行业特质性差异造成结论偏误,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剔除数据存在严重缺失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17 722个非平衡面板数据。

(二) 模型设定

本文设定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检验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

$$OR_{it} = \alpha_0 + \alpha_1 NewPro_{it} + X'_{it}\beta + \gamma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OR_{it} 表示企业*i*在年份*t*的组织韧性; $NewPro_{it}$ 表示企业*i*在年份*t*的新质生产力水平; X'_{it} 为控制变量向量; γ_i 为企业固定效应, λ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若 α_1 显著为正,则说明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提升企业组织韧性。

(三)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组织韧性(OR)。结合前文对企业组织韧性的定义,借鉴杨蕙馨和于梦晓^[25]的研究,采用企业资产收益率的波动作为组织韧性的代理变量。资产收益率这一财务指标集中体现了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最终经济结果,其稳定性能够综合反映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抵御能力、反应与调整能力以及恢复与发展能力。在具体测度方面,以每三年为一个滚动窗口计算企业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其波动越小即企业经营状况越稳定,组织韧性越强。为获得与韧性内涵方向一致的正向指标,对原始波动值取相反数,构造企业组织韧性变量。

2. 解释变量

新质生产力($NewPro$)。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3]。其中,劳动者向知识型与创新型演进,劳动资料呈现智能化与绿色化特征,劳动对象从实体性资源扩展至数据等新型要素,三者相互优化组合后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系统。因此,在张秀娥等^[26]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测度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指标体系(见表1),并采用熵值法加权计算。在新质劳动者维度,分别从技术执行端的员工素质与战略决策端的管理层素质两方面进行量化测度。采用企业“高学历员工占比”与“研发人员占比”衡量员工素质,采用“高管数字化背景”与“高管研发背景”衡量管理层素质。高管数字化背景借鉴王超

等^[27]的方法,使用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教育背景数据,筛选出具有数字化相关专业背景的高管,并构建高管是否具有数字化背景的虚拟变量。高管研发背景借鉴张栋等^[28]的方法,使用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特征数据,筛选出高管团队中具有研发职业背景的高管,并构建高管是否具有研发背景的虚拟变量。在新质劳动资料维度,采用“智能化”与“绿色化”作为二级指标,它们是技术革命性突破下生产工具演进的“一体两翼”,体现出“技术-生态”的协同优化。智能化水平选取“人工智能投资水平”与“数字技术创新”两个指标衡量,前者使用企业人工智能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作为指标,后者使用企业当年独立申请的关键数字技术发明数量的对数作为指标。绿色化水平选取“绿色技术创新”衡量,使用企业当年独立进行申请的绿色发明数量的对数作为指标。在新质劳动对象维度,围绕要素形态跃迁与价值内核重构,分别从数据要素与环境保护两方面衡量。数据要素方面使用企业的数据资产衡量,借鉴何瑛等^[29]的方法,使用文本分析法衡量数据资产,提取出数据资产关键词,以数据资产相关关键词词频进行测度。环境保护方面使用企业的环境绩效衡量,选取上市公司环境、社会与治理(ESG)评级中的环境主题得分进行衡量。

表 1 新质生产力的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衡量方式	属性
新质劳动者	员工素质	高学历员工占比	硕士及以上员工数量/员工数量	正
		研发人员占比	研发人员数量/员工数量	正
	管理层素质	高管数字化背景	高管是否具有数字化背景	正
		高管研发背景	高管是否具有研发背景	正
新质劳动资料	智能化	人工智能投资水平	人工智能资产/资产总额	正
		数字技术创新	ln(1+关键数字技术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正
	绿色化	绿色技术创新	ln(1+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	正
新质劳动对象	数据要素	数据资产	数据资产相关关键词词频	正
	环境保护	环境绩效	ESG 评级中的环境主体得分	正

进一步地,基于上述指标体系测度企业层面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并得到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时间趋势图。如图 1 所示,2011—2023 年,全国及各地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演变趋势,是中国持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使得企业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在宏观层面的反映。在区域格局上,始终保持东部地区领先、中部地区跟随、西部地区相对滞后的梯度分布特征,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地区增长节奏基本契合。这一梯度格局与现实经济状况相吻合,东部地区依托雄厚的科创资源、高端产业基础和头部企业的集聚,新质生产力发展长期处于领跑位置,中部地区承接产业升级与技术转移,西部地区受制于创新要素禀赋与产业结构等明显短板,整体水平相对滞后。由于中部、西部地区在布局新能源、算力等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及强化区域创新生态建设等方面成效显著,近年来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增长趋势明显。

3. 控制变量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17, 23],加入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企业规模($\ln Size$),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年龄($\ln FirmAge$),采用企业成立年份的自然对数衡量;资产负债率(Lev),采用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衡量;固定资产比例($Fixed$),采用固定资产与总资产之比衡量;托宾 Q 值($TobinQ$),采用企业市场价值与资产重置成本之比衡量;股权集中度($Top5$),采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数占总股本之比衡量;管理层持股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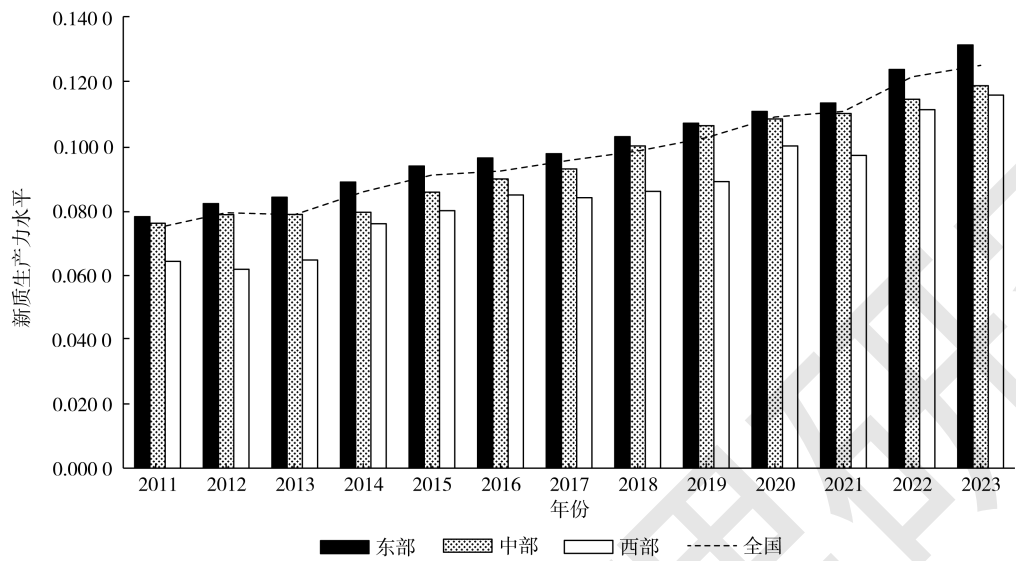


图 1 全国及三大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Mshare*),采用管理层持股数与总股本之比衡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采用机构投资者持股数与总股本之比衡量;独立董事占比(*Indep*),采用独立董事与董事人数之比衡量;审计质量(*Big4*),采用是否经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审计衡量,是为1,否则为0。同时,加入企业与年份的固定效应。

(四) 变量描述性统计

从表2中可以看出,2011—2023年企业组织韧性(*OR*)的最大值为0.0000,最小值为-0.6502,均值为-0.0290,标准差为0.0405,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组织韧性存在一定的差异。企业新质生产力(*NewPro*)最大值为0.6336,最小值为0.0005,均值为0.1001,标准差为0.1061,说明中国大部分上市公司新质生产力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其余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均在合理范围之内。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i>OR</i>	17 722	-0.029 0	0.040 5	-0.650 2	0.000 0
解释变量	<i>NewPro</i>	17 722	0.100 1	0.106 1	0.000 5	0.633 6
控制变量	<i>Size</i>	17 722	1.85×10^{10}	7.86×10^{10}	1.62×10^8	2.90×10^{12}
	<i>Firmage</i>	17 722	20.829 8	5.833 9	5.000 0	66.000 0
	<i>Lev</i>	17 722	0.416 1	0.144 1	0.014 3	1.222 8
	<i>Fixed</i>	17 722	0.205 2	1.402 5	0.000 2	0.875 8
	<i>TobinQ</i>	17 722	2.091 0	0.151 0	0.611 2	22.572 5
	<i>Top5</i>	17 722	0.510 9	0.248 5	0.064 7	0.987 8
	<i>Mshare</i>	17 722	13.946 1	18.471 7	0.000 0	87.879 1
	<i>Inst</i>	17 722	0.412 2	0.297 7	0.000 0	1.010 8
	<i>Indep</i>	17 722	37.867 0	5.602 9	14.290 0	80.000 0
	<i>Big4</i>	17 722	0.059 4	0.236 3	0	1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

企业新质生产力与组织韧性之间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组织在乌卡(VUCA)环境中的抵抗冲击与不确定性的组织韧性。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i>NewPro</i>	0.007 5*** (2.870 2)	0.017 1*** (3.096 0)
<i>lnSize</i>	0.003 0*** (8.022 7)	0.008 3*** (5.528 3)
<i>lnFirmage</i>	-0.003 9*** (-4.304 8)	0.011 0* (1.879 2)
<i>Lev</i>	-0.008 4*** (-3.156 5)	-0.045 3*** (-8.690 9)
<i>Fixed</i>	0.005 8*** (2.803 0)	-0.000 2 (-0.045 7)
<i>TobinQ</i>	-0.001 7*** (-6.947 8)	0.001 0*** (2.744 9)
<i>Top5</i>	0.008 5** (2.559 8)	0.031 5*** (4.698 6)
<i>Mshare</i>	0.000 2*** (5.228 1)	0.000 4*** (6.923 9)
<i>Inst</i>	0.028 1*** (9.540 7)	0.003 9 (0.793 5)
<i>Indep</i>	-0.000 3*** (-4.372 7)	-0.000 1* (-1.726 8)
<i>Big4</i>	-0.005 8*** (-4.503 4)	-0.005 1 (-1.553 9)
常数项	-0.087 0*** (-10.839 8)	-0.249 2*** (-7.183 5)
企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7 722	17 722
$\overline{R^2}$	0.045 5	0.447 5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 *t* 值均经过稳健调整。后表同。

(二) 内生性分析

为缓解新质生产力与企业组织韧性之间存在由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等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采取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借鉴李云鹤等^[30]的研究,选取样本企业所在城市 1984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工具变量(*iv*)。在相关性方面,地区早期的固定电话普及程度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历史基础与重要起点,能够为后续互联网、数字化等发展积蓄物质条件,从而持续影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等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的培育与扩散,因此与当期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历史关联。在外生性方面,该变量为纯粹的历史截面数据,与当前企业组织韧性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从而满足工具变量所需的外生性。另外,由于城市 1984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为横截面数据,不能直接用于面板数据计量分析,因此引入滞后一期全国互联网接入端口数与样本企业所在城市 1984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构建交互项,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表 4 中的结果表明,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的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第二阶段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在 5%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新质生产力确实提高了企业的组织韧性。同时,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显著,拒绝了不可识别假设;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值为 26.066 0,

高于 Stock-Yogo 弱工具变量临界值 16.380 0,排除了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 4 内生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1)	(2)
<i>NewPro</i>		0.039 0** (2.571 2)
<i>iv</i>	0.079 2*** (4.008 2)	
常数项	-1.023 2 (-1.622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Kleibergen-Paap rk LM	17.936 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26.066 0	
样本量	17 722	17 722
$\overline{R^2}$	0.790 9	0.508 1

(三) 稳健性检验^①

第一,替换被解释变量。借鉴陈俊华等^[31]的做法,使用企业股票价格波动率作为组织韧性的代理变量。第二,替换解释变量。参考陈升等^[32]的做法,确定新质生产力相关种子词汇,并对各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进行词频分析以构建新质生产力政策文本数据(*Policy*)。第三,增加高维固定效应。加入年份×行业、年份×城市的固定效应,控制行业和城市层面随时间变化但不可观测的因素。第四,替换聚类稳健标准误。使用个体与年份两个维度双向聚类的标准误。上述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均表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四) 机制检验

采用两步法^[33]对新质生产力影响企业组织韧性的理论机制进行检验,当机制变量为连续变量时,使用模型(2)进行检验;当机制变量为 0/1 虚拟变量时,使用模型(3)进行检验。具体公式如下:

$$M_{i,t} = \alpha_0 + \alpha_1 NewPro_{i,t} + X'_{i,t} \beta + \gamma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N_{i,t} = \beta_0 + \beta_1 NewPro_{i,t} + X'_{i,t} \beta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M_{i,t}$ 与 $N_{i,t}$ 为机制变量。 M_{it} 代表企业供需偏离度,以及内部控制水平与全球创新网络融入程度中采用连续变量衡量的机制变量, N_{it} 代表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与全球创新网络融入程度中采用虚拟变量衡量的机制变量。

第一,企业供需偏离度(*Sdd*)作为作用机制。供需偏离度即企业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偏离程度,参考杨志强等^[34]的做法,采用企业生产波动性与需求波动性之比衡量,其中企业生产量使用营业成本加年末存货净值作为代理变量,企业需求量分别使用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作为代理变量,从而得到两个衡量供需偏离度的指标 *Sdd1* 和 *Sdd2*。如表 5 前两列回归结果所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缓解企业内部的供需偏离度,从而赋能企业构建韧性组织。

第二,企业内部控制水平(*Icl*)作为作用机制。参考陈红等^[23]、聂萍等^[35]的做法,采用两个指标衡量内部控制水平。一是使用“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衡量(*Icl1*),该值越大表明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越高。二是使用企业是否存在重大内部控制缺陷衡量(*Icl2*),若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存在“重大缺陷”或“重要缺陷”,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如表 5 中间两列回归结果所示,当用内部控制指数衡量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时,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当用内部控制缺陷衡量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时,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说明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提升企业内部控制

^① 限于篇幅,省略稳健性检验的具体结果,备索。

水平,实质性提升韧性水平。

第三,企业全球创新网络融入程度(*Gin*)作为作用机制。参考李雪松等^[24]、郑玮^[36]的做法,采用两个指标衡量企业全球创新网络融入程度。一是根据上市企业是否成立海外关联企业衡量其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程度(*Gin1*)。具体做法为:若企业在某一年设立了海外关联企业,则该企业在本年度及以后均被认定为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否则认定为未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二是使用企业的海外业务收入衡量其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程度(*Gin2*)。如表5最后两列回归结果所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帮助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实现组织韧性的提升。

表 5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企业供需偏离度		企业内部控制水平		企业全球创新网络融入程度	
	<i>Sdd1</i>	<i>Sdd2</i>	<i>Icl1</i>	<i>Icl2</i>	<i>Gin1</i>	<i>Gin2</i>
<i>NewPro</i>	-0.739 6*** (-3.417 4)	-0.487 9*** (-2.740 9)	0.301 4*** (2.761 3)	-0.852 5*** (-8.262 0)	0.819 6*** (8.904 0)	0.791 0*** (3.509 1)
常数项	-1.005 5 (-0.625 6)	1.714 7 (1.299 4)	2.651 3*** (3.711 4)	-4.779 4*** (-18.199 3)	-6.848 1*** (-28.195 4)	-11.572 1*** (-16.172 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5 809	15 829	17 722	17 722	17 722	15 908
$\overline{R^2}$	0.224 7	0.690 8	0.236 9			0.223 9

(五) 异质性分析

1. 企业市场势力异质性

企业的市场势力差异会影响新质生产力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的程度。借鉴黄叙涵等^[37]的做法,采用企业营业收入与行业总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企业的市场势力,当企业市场势力高于年度行业内所有企业市场势力中位数时,则为高市场势力企业(*Mar1*),否则为低市场势力企业(*Mar2*),分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在高市场势力企业中新质生产力对组织韧性影响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在低市场势力企业的影响不明显。存在这种显著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市场势力强的企业通常拥有充足的资源与稳定的客户基础,这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转化提供了关键条件。

表 6 企业市场势力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i>Mar1</i>	<i>Mar2</i>
<i>NewPro</i>	0.020 2*** (3.334 6)	0.013 2 (1.332 8)
常数项	-0.201 4*** (-3.916 5)	-0.455 4*** (-7.186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8 742	8 980
$\overline{R^2}$	0.502 9	0.454 1

2. 企业要素密集度异质性

企业要素密集度的差异会影响新质生产力对组织韧性的提升效应。借鉴刘贯春等^[38]的研究,采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与年末从业人数的比值取自然对数衡量企业资本密集程度,将中位数以上企业划分为资本密集型(*Capital1*),中位数以下划分为劳动密集型(*Capital2*)。如表7前两列回归结果所示,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劳动密

集型企业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竞争力高度依赖于技术进步与工艺革新,在面对日益激烈的技术迭代压力时,该类行业更有动机将新质生产力定位到战略性高度而非边际改进,将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入从研发到销售的全链条,由此全面推动企业组织韧性的塑造。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制于资源约束、技术基础薄弱等,难以通过将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引发组织韧性的系统性跃迁。

3. 行业科技属性异质性

企业所处行业的技术属性差异会使得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组织韧性的影响产生异质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高技术产业分类(制造业)2017》和《高技术产业分类(服务业)2018》,将企业分为高技术产业企业(Tech1)和非高技术产业企业(Tech2)并进行分组回归,如表7后两列回归结果所示。高技术产业企业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非高技术产业企业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且基于费舍尔组合检验法重复抽样1000次计算得到的组间系数差异P值显示两者的回归系数存在明显差异。原因可能在于,高技术产业企业处于技术密集、产品迭代迅速和市场高度竞争的环境中,这种外部环境迫使企业持续进行技术创新与战略更新,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进而有效提升组织韧性;而非高技术产业企业处于技术变革相对缓慢、市场结构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缺乏外部压力,其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有限,从而对组织韧性的提升作用较弱。

表 7 企业要素密集度与行业科技属性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企业要素密集度		行业科技属性	
	Capital1	Capital2	Tech1	Tech2
NewPro	0.024 6*** (3.623 1)	0.001 1 (0.116 9)	0.018 4*** (2.626 9)	0.020 5** (2.472 1)
常数项	0.024 6*** (3.623 1)	0.001 1 (0.116 9)	-0.287 2*** (-5.874 9)	-0.221 7*** (-4.350 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9 791	7 931	10 569	7 153
$\overline{R^2}$	0.499 4	0.449 2	0.437 0	0.486 2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立足于新质生产力与企业组织韧性理论内涵,分析了新质生产力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理,并基于2011—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包括:第一,新质生产力能够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第二,企业供需偏离度的缓解、内部控制水平的提升与全球创新网络的融入,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企业组织韧性提升的重要机制,三者通过作用于企业组织韧性的动态能力发挥作用;第三,在高市场势力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内企业,新质生产力对组织韧性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以上研究结论能够为企业培育和发展新质生

产力进而提升组织韧性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第一,构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长效机制,为提升企业组织韧性创造内在驱动力。引导和鼓励企业将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长期战略,持续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导向,既加大研发投入攻关核心技术,也鼓励模式创新和组织变革,为提升组织韧性注入源头活水。同时,重视数据要素的储备与开发,通过前瞻性布局算力基础设施,深入挖掘其驱动决策与创新的价值。企业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要强化市场导向,确保创新成果能快速转化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从而实现价值转化,获得必要的经济回报,构成新一轮研发投入的核心激励,形成企业组织韧性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将新质生产力全方位渗透进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全流程,始终贯彻绿色低碳理念,积极发展绿色生产力,寻求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从源头到终端实现整体效能与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性提升,从而不断提升组织韧性。

第二,引导企业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实现企业嵌入的结构深度与地理广度协同并进。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作为新质生产力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的关键机制之一,其嵌入深度与合作广度有助于企业将外部资源有效转化为可持续的创新能力并通过广泛多元的网络连接摆脱路径依赖,增加应对外部冲击的灵活性。一方面,通过建设国际技术转移与共性技术研发平台,为企业提供从技术评估、消化吸收到适应性改造的全链条服务,培育企业对异质性知识的内化与再创新能力,从而将网络优势转化为应对冲击并实现迭代的组织韧性。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企业“走出去”,提升对全球性异质创新资源与多元化市场空间的利用效率,支持企业不仅在传统技术高地设立研发中心,更应向“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国家进行战略性布局,建立多元化海外研发平台;同时,积极主导和参与高标准国际科技合作协定,推动构建和维护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为企业构筑链接更多元主体的创新网络减少合作壁垒。

第三,全面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各类企业依托新质生产力提升企业组织韧性构建包容均衡的制度体系和市场生态。重点突破数据、技术、人才等新型要素的市场化瓶颈,同时注重改革政策的普惠性,为中小微企业获得创新资源创造条件。探索建立数据产权登记、评估与交易机制,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促进企业间数据资源的合规流通与融合应用,打破“数据孤岛”;加快发展区域技术交易平台,提高科技成果本地转化效率与价值实现;破除户籍、学历等隐形人才流动壁垒,建立以创新能力与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与激励体系,促进人才要素及其附着的知识资本在政产学研间顺畅流动。通过构建信息透明、流转顺畅的现代要素生态,明显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创新风险,从而助力新质生产力更充分地转化为企业应对复杂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组织韧性。

参考文献:

- [1]单宇,许晖,周连喜,等. 数智赋能:危机情境下组织韧性如何形成?:基于林清轩转危为机的探索性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2021,37(3): 84-104.
- [2]沈路,钞小静. 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供应链溢出效应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2025(5):271-288.
- [3]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 求是,2024(11):4-8.
- [4]任保平. 生产力现代化转型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逻辑[J]. 经济研究,2024,59(3):12-19.
- [5]余东华,马路萌.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理论阐释和互动路径[J]. 天津社会科学,2023(6):90-102.
- [6]周文,白洁. 新质生产力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机理、重点方向与战略路径研究[J]. 齐鲁学刊,2025(6):101-114.

- [7]徐政,郑霖豪,程梦瑶.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J]. 当代经济研究,2023(11):51-58.
- [8]Coutu D. How resilience works[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2,80(5):46-56.
- [9]余东华,黄念. 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产业链韧性吗?[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45(8):81-102.
- [10]陈冲,杨自伟,王贝贝,等. 坚韧型领导:多维度结构、测量与组织韧性影响验证[J]. 管理科学,2023,36(3):51-65.
- [11]Williams T A,Gruber D A,Sutcliffe K M,et al. Organizational response to adversity:fusing crisis management and resilience research strea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2017,11(2):733-769.
- [12]张梦桃,张生太. 关系网络对组织韧性的影响:二元创新的中介作用[J]. 科研管理,2022,43(7):163-170.
- [13]张尧,杨小伟.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现金持有与企业组织韧性[J]. 管理科学,2025,38(2):102-126.
- [14]Mafabi S,Munene J C,Ahiauza A. Organisational resilience:testing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creative climate[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2013,13(1/2):70-82.
- [15]Jiang S Y,Yeung A C L,Han Z J,et al. The effect of customer and supplier concentrations on firm resilienc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power balancing[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2023,69(3):497-518.
- [16]郭晔,赵昊,陈海强. 社会责任承担、利益相关者支持与企业韧性[J]. 世界经济,2025,48(6):123-155.
- [17]王鹏,陈蝶欣.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企业韧性:来自机器学习构建 AI 词典的经验证据[J]. 经济学动态,2025(9):98-117.
- [18]杨伟,汪文杰. 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财务冗余和管理者短视主义的调节效应[J]. 管理评论,2024,36(8):200-211.
- [19]贾勇,傅倩汪琳,李冬姝. 技术创新与企业韧性:基于新冠疫情情景[J]. 管理科学,2023,36(2):17-34.
- [20]潘越,柯进军,宁博. 不确定性冲击、政府采购与企业发展韧性[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41(4):193-212.
- [21]柳永天,侯珏,毕晓方. 企业新质生产力对数据资产价值的影响研究[J]. 科学决策,2025(4):142-166.
- [22]Acemoglu D,Restrepo P. 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8,108(6):1488-1542.
- [23]陈红,郭彤梅,张玥,等. 内部控制对制造业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J]. 南开管理评论,2026,29(1):51-61.
- [24]李雪松,党琳,赵宸宇. 数字化转型、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J]. 中国工业经济,2022(10):43-61.
- [25]杨蕙馨,于梦晓. 制造业企业服务化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6,47(6):127-142.
- [26]张秀娥,王卫,于泳波. 数智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25,43(5):943-954.
- [27]王超,余典范,龙睿.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垫脚石还是绊脚石?[J]. 经济管理,2023,45(6):79-100.
- [28]张栋,胡文龙,毛新述. 研发背景高管权力与公司创新[J]. 中国工业经济,2021(4):156-174.
- [29]何瑛,陈丽丽,杜亚光. 数据资产化能否缓解“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融资约束[J]. 中国工业经济,2024(8):154-173.
- [30]李云鹤,蓝齐芳,吴文锋. 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的供应链扩散机制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22(12):146-165.
- [31]陈俊华,郝书雅,易成. 数字化转型、破产风险与企业韧性[J]. 经济管理,2023,45(8):26-44.
- [32]陈升,刘子俊,张楠,等.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注意力与政府治理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26,44(6):1331-1344.
- [33]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2022(5):100-120.
- [34]杨志强,唐松,李增泉. 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关系型合约与供需长鞭效应:基于供应链信息外溢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20,36(7):89-105.
- [35]聂萍,潘再珍,肖红英. 问询函监管能改善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吗?:来自沪深交易所年报问询的证据[J]. 会计研究,2020(12):153-170.
- [36]郑玮. 国际化对开放式创新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国际贸易问题,2020(10):51-66.
- [37]黄叙涵,张玲,马光荣,等. 社保费征管、市场势力与企业负担:基于社保移交税务征管的研究[J]. 财贸经济,2024,45(3):5-22.
- [38]刘贯春,叶永卫,张军. 社会保险缴费、企业流动性约束与稳就业:基于《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J]. 中国工业经济,2021(5):152-169.

How Ca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nhance Corporat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YU Donghua, SU Qi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Abstract: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s a capability that enables firms to maintain stability and achieve development, can effectively counteract external shocks arising from an uncertain environment. Enhancing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firms to ensur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mid multiple challenges.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QPFs) constitutes a critical pathway for firms to enhanc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nd buil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a strategic initiative to cope with uncertain risks and external shocks.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internal logic and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NQPFs enhance corporat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is integral to achieving a virtuous interplay betwe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security.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nd its associated dynamic capabilit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ernal logic and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NQPFs enhanc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panel data from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3.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QPFs enhances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Meanwhile, the enhancement is achieved mainly through three channels: alleviating supply-demand deviations, elevating internal controls, and facilitating firms' integration into 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NQPFs o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high-tech firms, firms located in highly marketized regions, and firms at the mature stage.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NQPFs to strengthen firms' core capabilities and market competitiveness can generate internal drivers for bolstering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hereby consolidating the micro-foundation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reefold. First, by integrating adaptive cycle theory,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theory,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ory, it analyzes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manifested in corporat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nd examines how NQPFs enhanc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by empowering such dynamic capabilities as risk resistance, response and adjustment, and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This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strategic value of NQPFs and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formation. Second, by synthesizing both firms' internal operations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NQPFs bolster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external linkage mechanism—internal optimization via supply-demand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 governance, and external connectivity via integration into 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s—it provides a more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for enhancing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hird, moving beyond specific, short-term crisis-response contex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ole of NQPFs as a foundational and evolutionary enabling force in enhancing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over a long-term continuous timeframe, thereby offering new insights for firms to navigate external uncertaintie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rporat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dynamic capability; market competitive advantage; supply-demand deviation; 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

编校:姜 莱